



「沒有歷史的人： 探索公義的歷史之路」 論壇側記

撰文／朱音韶
攝影／劉恩美

當你看到紅葉少棒、樂生療養院、臺籍日本兵、山東流亡學生，這幾個關鍵詞被擺在同一場論壇時，你或許會困惑：這四個詞彙或它們代表的議題，彼此間有什麼關聯性？11月1日這場在修齊講堂，由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的「沒有歷史的人：探索公義的歷史之路」論壇，似乎提供一個共同思考這些議題的觀點。

開場先由成功大學歷史系的謝仕淵副教授、文學院陳玉女院長以及吳誠文副校長初步說明、談論這場論壇的題旨與在論壇之外的社會實踐行動背後的意義。也期盼能透過這場論壇，引起更多人關注這些課堂外的議題，重拾起這些其實生命曾經遭受重大影響、但卻被歷史所遺落的人事物，這些人權正義的問題也對社會文化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是不可被忽略的。

因國族而被扭曲的生命記憶：不被允許長大的紅葉少棒

第一個議題與紅葉少棒有關，首先由謝仕淵副教授來談他多年所關心的紅葉少棒的問題，這與整個棒球制度和價值五十年來沒有改變的問題有關，因

此他先給予與會者一些基本的歷史背景鋪陳。1968年，紅葉少棒在與日本關西聯隊的球賽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似乎」打敗了世界冠軍，改變長久以來臺灣對日本錯綜複雜的曾為殖民地的自卑情感與弱勢關係。這樣的訛傳激發了臺灣人對成為平民英雄的嚮往，加溫棒球熱潮，引發政府關注棒球運動，甚至帶來體育界以外的影響。80年代更以大眾化的方式，將紅葉記憶銘刻於臺灣人的腦海中。

但隨著這群小孩長大，不但沒有得到後續被承諾的栽培，還得背負許多期待與壓力。即便以後離開了棒球界，這群長大成人的小孩也沒有資源繼續打棒球，甚至還有些輿論與爭議排山倒海而來，促使這件事情反而變成他們的傷痕、避而不談。一直到近幾年，透過一些關心棒球的人努力，他們才願意鬆口自述，彷彿一種與過去的自己和解。而這種情形，其實與我們至今在棒球選手上所寄託的沈重關注是相似的，這也是整個臺灣棒球一直存在的體制問題。

呼應謝仕淵所言，邱聖德老師則以過去研究紅葉少棒議題的經驗以及紅葉少棒隊員兒子的身份來談論

這個議題。隨著紅葉少棒的輝煌時光過去，如果不再做田野調查、口述歷史，其實這段歷史記憶就會隨著這些人的離世而逐漸凋零，直至被後世遺忘。也因為謝仕淵去研究調查這段歷史，讓他想要將少棒館重新獨立、整理裡面的東西，解構一直根深蒂固的國族主義，將這些民族主義的重擔從球員身上卸除，讓他們自己以及臺灣人可以好好地檢視這段歷史。

聽完兩位的發表，吳誠文也回應，政府應該要回頭檢視歷史，尤其是像紅葉少棒這樣被凍結、遺忘的歷史，才有展望未來的可能。而一些運動上的政策應與文化政策結合，也和國民的生活結合，在制度上的運作應該放手民間自主，盡可能跳脫過去威權時代過度掌控的方式，化解衝突、有所改變，讓整個臺灣體育的發展得以正常化。

被迫遺忘的悼念：亡故於南洋的臺籍日本兵之家屬

下一場的議題則是談到臺籍日本兵與他們的遺族，這個議題與二次世界大戰有關，二戰對於臺灣社會有著深刻的影響，但相關討論卻十分稀少。主持人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汪宏倫研究員，第一位發表人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他談的是「臺灣的二戰戰歿者與遺族的記憶」。這場戰爭雖然離我們不遠，卻很少人知道二戰期間，約有二十萬的臺灣人大量被徵召到南洋，擔任非戰鬥任務的軍屬，大部分的臺灣人戰歿者也都是這批被派遣到海外戰場的軍屬。

為什麼臺灣人的戰爭記憶在過去的歷史裡沒有被記錄下？這是因為政權的更迭，這群臺籍日本兵在中華民族的抗日記憶中被強迫抹除了。引介「戰爭之框」的說法，臺灣人作為日本殖民地、對抗同盟國的歷史，無法被擺入抗日戰爭的戰爭之框中。



文學院陳玉女院長。

這些等待、痛失親屬的遺族，在沒有遺骨、遺體的情況下無法進行紀念、無法接受死亡，只能不斷尋覓、等待死亡的證據，在中華民國不承認的歷史中迷失。

而藍適齊也提到，他曾經在臺籍日本兵遺族的家中，看見祖先牌位旁立著一份由靖國神社1977年發的一份合祀通知書，這是一個彷彿紀念勳章、紀念碑的物質性證據。他們沒辦法到南洋朝聖，因此選



從左至右依序為邱聖德、吳誠文、謝仕淵。



從左至右依序為陳柏棕、汪宏倫、藍適齊。



從左至右依序為陳芸娟、林寶安、王健文。



從左至右依序為范燕秋、林從一、巫宛蓉。

擇到靖國神社祭拜。這份對紀念與哀悼的的執著，象徵的就是與遺忘的對抗，這些遺族不希望自己的親人被忘記，想證實他們確實在歷史中存在過，並非沒有歷史的人。

藍適齊也向大家介紹一位高砂義勇隊的後代，他的祖父曾經到新幾內亞參戰且存活，2013年時，他就到新幾內亞朝聖，為戰歿者舉行慰靈招魂，希望這些戰死的原住民靈魂能夠透過這個儀式歸途還鄉，並從戰場上帶回一些泥土跟石頭。而透過實際的行動，除了給予遺族一個悼念的機會，也更能夠確立臺灣人二戰「戰歿者」和「遺族」作「歷史主體」。

第二位發表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員、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陳柏棕，他主要在探討臺灣二戰遺族與戰歿者紀念場域，以新竹北

埔濟化宮為例。他介紹了一些臺籍日本兵被處死的例子，透過一些具體家族遺族的案例來觀察戰爭造成的影響。像是有一位戰間擔任英米俘虜監視員、為阻止戰俘逃亡射殺俘虜，最終被處死的林金隆。有些遺族終身不願提起這些戰歿者，甚至希望這段歷史永遠不要提起；有些遺族則始終相信自己家人的清白，一生都在找尋他存在過的證據。戰爭造成許多家庭破碎，而更遺憾的是如藍適齊所說的「戰爭之框」問題，臺灣的遺族無法如日本遺族快速、光明正大地集結哀悼紀念，沒有紀念，這些人很快就被遺忘，成為沒有歷史的人。

而一間1961年創建，原為新竹縣北埔鄉客籍礦工的小眾信仰：濟化宮卻給了這些遺族希望。他們前往靖國神社迎靈，為合祀的臺灣人戰歿者製作3萬餘座、塑膠材質「靈位牌」，並有祭神簿來供遺族查詢自己的戰歿者親屬。雖然這間廟宇後來引發一些

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確實讓一些臺灣家屬得到慰藉，找到自己親屬曾經存在並為戰爭而死的證明。如臺籍日本兵張金章跟陳世鐘遺族就是在這裡找到這些早逝的成員，讓家屬得到心靈補償，並且有個具體的管道可以祭拜。

汪宏倫也回應其實紅葉少棒與臺籍日本兵的事，便清楚展示所謂大寫的歷史與小寫的歷史，也就是國族框架下所寫的歷史和個人家族的歷史之間的張力，而臺灣作為一個集體，在整個東亞的近現代史中其實是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在場的一些觀眾也分享了自己家族中臺籍日本兵的故事以及對宗教在這件事情中的地位提出興趣。兩位發表者也做簡單的回應與交流，包含自己尋找這段歷史並拼湊建構的過程。

外省人的白色恐怖：離臺灣人更遙遠的受害經歷

第三場談論的議題則是外省人的白色恐怖案例，在臺灣本土化、呼籲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外省人的白恐經常是被忽略的一塊，因為很多檯面上的外省族群是既得利益者。但實際上在戒嚴期間，有許多外省人也莫名被國民黨消失，最大的一起政治受害案件便是澎湖七一三事件（山東流亡學生案）。而這一場次邀請到的其中一位講者便是父親陳永昌曾是山東流亡學生的陳芸娟，他的碩論談七一三，在座談中他也提到兒時對父親以及他的朋友的回憶，尤其是在提到七一三時彷彿驚弓之鳥的反應，他在長大後才輾轉將這些事情與七一三連結。

就像其他幾位學者拼湊紅葉少棒或臺籍日本兵的過程相似，這些當事人或他們的家屬，總是小心翼翼地談論，或甚至不願意談，政治迫害的經驗讓他們懼於公開、具名談論。有時也因為年紀大了記憶有所錯亂，甚至一一去世，這都是陳芸娟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境。但為了他的父親以及這些同窗、同袍，陳芸娟仍完成了這份研究，並透過講座讓更多人知道七一三事件的過程，為外省人白色恐怖的受害經驗留下一份珍貴的紀錄。

至於第二位發表人王健文，雖然並非相關專業，但

他也期許能以一個非專業的立場與陳芸娟的研究有所呼應。王健文談的外省人白色恐怖，範圍更廣泛，他認為許多外省人孤身一人到臺灣，他們的歷史更容易被遺忘、消除，也是現在歷史視角不容易照顧到的人，是沒有歷史的人。而除了剛才提到七一三，王健文也以文學作品中的一些橋段來證明，如楊牧描述到年少時期在課堂上曾有外省人教師「被消失」，另外也有一些國小校長，甚至外省基層公務員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入獄。這些情況與本省人遭遇的其實幾乎一樣，可能因為讀書會被渲染成共產黨集會、被強冠匪諜之名，或者是因為受他人連累而受難，但白色恐怖時期外省人的受難記憶卻很少被現在的歷史觀關注。

在進行一些討論後，有觀眾提問關於做這些事情的意義與目的，三位都有簡單的回應。主持人林寶安認為人沒有記憶就不曉得未來可以做什麼，正因有歷史與史觀，才能讓不同的聲音有個出口。王健文則認為自己是誠懇地聽故事，他也尊重每個人的感受與經驗，甚至無法開口談論的難言之隱。這些行動對他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而是一些該做的事而已。陳雲娟更直接地說，其實他做這些就是為了幫自己的爸爸紀錄故事，而且也努力忠於事實、學習歷史。

樂生的藩籬後：這些人曾經被記憶嗎？

來到最後一個場次則是跟樂生療養院的拆建有關的議題。這一場次由林從一主任主持，扣回人社中心一直強調的一個目標：「成為臺灣人」，其實正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人」的對應，也是透過這些研究以及實踐研究才能建構出也許是比較好的臺灣社會。而除了回顧歷史與之對話，也期盼能邁向未來，回應關於當代議題中關於正義的問題。

這一場的第一位講者是臺師大臺史所的范燕秋老師。樂生院的問題其實是聚焦在醫療人權，因為國家發展公共衛生，在疾病處理上以更強的權力去決定將一個人放置在社會的哪個位置，樂生院的院民們便是活生生的例子。這群院民承受漢生病菌（又

成癩病或麻瘋病），他們因為疾病的污名化所導致的社會偏見，加上國家公衛政策的強迫隔離，即便後來治好也沒有辦法回到社會，因而成為一群邊緣弱勢的院民，被遺忘或者從未被記憶過。

為什麼他們被遺忘，而這群人要又如何被重新發現，這一直是范燕秋關注的議題。他的專長是醫療史、疾病史的研究，本身也曾經參與相關的社會運動，搶救因為捷運工程而要被政府摧毀的樂生院區。也因為這些機緣，從院區的史蹟保存到漢生病人權運動，可以看到公衛史、疾病史，以及臺灣整體的歷史。透過這些回顧，其實也可以重新思考這個議題帶給臺灣哪些新的價值跟社會實踐？不過在介入議題的同時因為也有支持與反對的不同聲音，因此范燕秋也拋出一個問題：怎麼樣能夠不加深院民對立的情況下能夠獲得最好的老年照顧？

另一位則是同參與其中、青年樂生聯盟的巫宛蓉小姐，他展示了樂生院自1930年代成立時的照片以及這個病症與院區的歷史、困境，以及他們如何與這些院民交流。這幾年他們致力於此，參與其中、訪談書寫，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議題。目前院區已經有70%被拆除，但他們還是努力於那30%的維護，舉辦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來倡議這件事，甚至投入人力、親自著手來修復並改造一些院區裡老舊的房舍。

巫宛蓉認為敘事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語言構成現實，當每個院民自述人生時，都可以重新賦予自己定義，讓這些邊緣的經驗可以被共享跟理解，再產生知識讓更多人了解。樂生療養院不僅僅是國家發展的問題而已，還有歷史與人的層面，讓民眾感受這些情感中產生的情感與抵抗動能，甚至思考其他的當代議題，是樂生院帶給他們的一個看待事情的面相。

林從文也提到國家與這些醫療人權的關係，認為不只是樂生病，其他疾病也有類似的問題，尤其國家力量介入，促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在反省這件事

情時，也幫助我們反省這些文化、文明，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因為這些被歷史遺忘的人到當代社會還是不斷發生。現場也有觀眾提出關於介入人權造成的內部問題，也有人分享自己作為樂生第二代的經驗。這些或許都是可以共同面對、學習的課題，也可以反映未來其他的議題，也感謝這些善意與大歷史的拼湊，才得以讓個人家族的歷史更加完整。

結語：做該做的事，繼續理解、走在探索公義的路上

四個場次都結束後，在最後的綜合座談中，有一些觀眾針對前面的場次有所討論。最後謝仕淵也再度提起關於大寫歷史與小寫歷史的問題，尤其在大寫歷史排除小寫歷史、歷史產生背後的國家力量介入的情況下，其實還夾雜著一些社會文化的觀點，來凸顯這些議題的重要性。而當我們在追求這些人文知識的實踐時，更應該如同王健文所追求的那樣：不是存著做好事、善事的心態，而是做應該做的事情，如此才能了解這些「沒有歷史的人」，並真切地走在探索公義的路上。



圖為觀眾提問時間。